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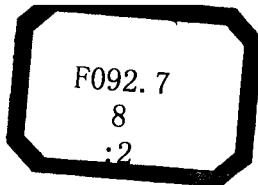
The China
Economics
100 Years
Classics

百年中国经济经典学

总主编 王振中
本卷主编 剧锦文

中卷 1949-1978

廣東省出版集圖社
廣東經濟出版社



中国经济学百年经典

(中卷 1949~1978)

总主编 王振中
本卷主编 剧锦文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学百年经典·中卷：1949～1978 / 王振中总主编，剧锦文主编。—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12

ISBN 7-80728-235-5

I . 中… II . ①王… ②剧… III . 经济学 - 文献 - 汇编
- 中国 - 1949~1978 IV . F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4422 号

出版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5 楼）
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刷	深圳市建融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 104 号 3 楼东)
开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张	29.5 3 插页
字数	712 000 字
版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
印数	1~5 000 册
书号	ISBN 7-80728-235-5 / F · 1366
定价	全套（上、中、下册）定价：2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广州市合群一马路 111 号省图批 107 号

电话：〔020〕83780718 83790316 邮政编码：510100

邮购地址：广州市东湖西路永胜中沙 4~5 号 6 楼 邮政编码：510100

（广东经世图书发行中心）电话：〔020〕83781210

营销网址：<http://www.gebook.com>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屠朝锋律师、刘红丽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50年）	刘少奇（1）
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发凡（1951年）	
——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纲第1~2讲	王亚南（10）
贯彻在广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诸基本原则（1951年）	1
——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纲第3~4讲	王亚南（35）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几个经济法则（1953年）	王学文（65）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法则问题（1954年）	王学文（103）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年）	吴承明（117）
论十大关系（节选）（1956年）	毛泽东（163）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1956年）	
陈云（175）	
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1956年）	
孙冶方（188）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1956年）	
尚钺（209）	
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1957年）	
顾准（233）	



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价值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

(1957年) 王 琢 戴园晨 (297)

人民币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商品的符号 (1957年)

..... 黄 达 (325)

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 (1957年) 傅筑夫 谷书堂 (346)

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 (1957年) 傅衣凌 (359)

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 (1957年)

..... 陈振汉等 (398)

试论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的特点与要求 (1957年)

..... 应成旺 (413)

官僚资本论 (1958年) 许涤新 (430)

技术进步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1958年) 蒋一苇 (469)

失业问题 (1958年) 马寅初 (501)

2 新人口论 (1959年) 马寅初 (505)

论生产力性质 (1959年) 平 心 (538)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 (1959年)

..... 于光远 (559)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1959年)

——在经济理论讨论会上海会议上的发言

..... 薛暮桥 (606)

从一年来大跃进中吸取经验教训 (1959年) 薛暮桥 (626)

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推动和生产力的相对独立增长

(1960年) ——七论生产力性质 平 心 (643)

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 (1961年)

..... 孙冶方 (676)

论价值——货币形态与使用价值 (1961年)

——实物形态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之间的平衡问题

.....	董辅礽 (690)
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比例和速度的数量关系的初步探讨 (1962年)	刘国光 (721)
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所有制形式 (1962年)	艾思奇 (755)
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 (1962年)	张闻天 (784)
论商品经济 (1962年)	卓 炯 (797)
流通概论 (1963年)	孙冶方 (816)
国民经济平衡和生产价格问题 (1963年)	杨坚白 (831)
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洋务运动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 (1963年) ——与邵循正先生商榷.....	汪敬虞 (867)
佃农理论 (1969年) ——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	张五常 (890) 3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 (1973年)	张闻天 (907)
关于社队企业问题 (1978年)	薛暮桥 (920)
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 (1978年)	蒋学模 (929)

国家的工业化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①

刘少奇

(1950年)

刘少奇（1898—1969）：湖南宁乡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刘少奇的经济思想是丰富和伟大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土地问题、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关于商业问题、关于合作社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等等，他的这些经济思想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对中国的经济学发展也作出了很大贡献。这里我们选取了刘少奇于1950年的一篇题为《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文献。这篇文献清楚地反映了刘少奇在发展国民经济模式选择上的重要思想，而今看来，他的这一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中国人民长期的夙愿。但是就如何实现

① 这是刘少奇的一份手稿。

国家的工业化，尽快使人民富裕起来，在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上却有着很大差别。就世界范围而言，工业化的道路不外有两条，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市场为导向，首先发展轻工业，然后再发展重工业的模式；另一种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以政府为主力，首先发展重工业，然后再发展轻工业的模式。建国初期，在中国应该走哪一条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毛泽东主张应该首先发展重工业，其理由是当时中国的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而言更加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特别是建国初期，我们处在帝国主义的军事包围之中，如果不能尽快加强国防实力，国家的安全就要受到威胁，而加强国防的唯一方法就是发展自己的国防工业，国防工业的直接基础就是重工业。因此，就应该首先发展重工业。毛泽东称之为施“大仁政”，然后等重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再来发展轻工业。毛泽东称之为施“小仁政”。刘少奇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建国之后，首先应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其次要以主要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次发展重工业，最后在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再来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实现机械化。刘少奇的这一主张是基于以下理由：“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工业以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因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只有轻工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农民需要的大量工业品，交换农民生产的原料和粮食，并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同时，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也可以把劳动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这对于改进人民的健康状况，在政治上进一步团结全体人民，也是非常需要的。而建立一些必要的急需的国防工业，则是为了保障我们和平建设的环境所不可缺少的。只有在这一步做得有了成效之后，我们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并发展重工业。只有在重工业建立之后，才能大大地发



展轻工业，使农业机械化，并大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直到现在，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世界许多先进国家比较起来，还是很低的。他们还很穷困，他们迫切地需要提高生活水平，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这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最大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力求实现的最基本的任務。

中国劳动人民为什么很穷困，他们的生活水平为什么很低呢？

从历史上来说，这有两个基本原因。

一个原因，是中国近代化的机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还很少。在国民经济中，百分之九十左右还是手工业和个体农业，在运输业中，也绝大部分是人畜力和木船运输。和机器工业比较起来，它们的生产力很低，耗费劳动力很大，不能生产出大量的物质资财来供人民享受。

另一个原因，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在中国的长期统治。他们无限制地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欺侮和压迫中国人民，并造成长期的战争和大量的土匪，阻碍中国工业的发展，压制和毁坏已经是很低的中国的生产力。这样，就不能不使中国的劳动人民更加陷于穷困和饥寒生活的深渊。

这就是造成中国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并且过着穷困、痛苦和被侮辱生活的两个基本原因。

怎样才能使中国劳动人民从穷困、痛苦和被侮辱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并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使他们能够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呢？

这就必须做好两件最基本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中国，肃清土匪，保障国内的和平，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及其他各种民主改革，消灭地主阶段及其他一切封建残余势力，从而在城市和农村中解放已有的生产力。这一件事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基本上做好了，未完的工作在不久以后也可以完成。以后的工作，就是继续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防止反动分子复辟的阴谋，加强国防力量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进攻。这虽然还是一项严重的需要付出很大的人力物力去完成的任务，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也是保证能够做好的。做好这一件事情的意义，只是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只是使他们从穷困、痛苦、被奴役、被侮辱的地位翻起身来，只是使中国已有的生产力获得解放，清除发展生产的障碍，造成继续发展生产的顺利条件，并且使生产的继续发展获得保障，不受内部的和外来的野蛮势力的破坏。但这还不是生产力的直接提高，还不是生产本身的发展，因而就不能很大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政府剥夺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财产，并将地主的财产无代价地转交给贫困的农民，人民政府又禁止了投机家的大量掠夺，并拨出了大量的款项救济灾民、失业工人及其他无以维持生活的人。这些，对于最穷困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是有一些补助的，但是这种补助是很少的，并且是暂时的。这就是说，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统一中国，剥夺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财产，还只是清除发展生产的障碍，造成发展生产的条件，还不是生产的直接发展，因而还不能立即和直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做好了这一件事，就使中国人民有可能并有了顺利的条件去做好第二件事。而

不做好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做不好的。过去许多实业救国论者的错误和他们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

第二件事情，就是利用已经建立并且巩固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主要的工具，并利用其他各种条件，配合各方面的努力，来发展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生产及其他经济事业。首先用一切办法在现有基础和现有水平上来提高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节省原料和材料，消灭浪费，降低生产品的成本，然后逐步地提高生产技术，建设新的生产事业，并使手工业和个体农业生产经过集体化的道路改造成为具有近代机器设备的大生产。这就是使中国逐步地走向工业化和电气化。只有工业化和电气化，才能建立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只有逐步地做好这件事情，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近代化的生产事业及其他经济事业，才能使中国人民逐步地提高生活水平，能够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而如果不能做好这件事情，就决不能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因为生产事业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乃是全体人民一切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基础。

只有做好了第一件事情，才有可能做好第二件事情。当我们去做好第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做好第二件事情。现在第一件事情已经或者差不多做好了，第二件事情也已经在一些地方开始进行，不久以后，就要更大规模地有全面计划地来进行，而且要永远继续下去，因为生产是更基本的，永远需要的。如果我们在做好第一件事情之后，不能接着把第二件事情做好，那我们的革命就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说是已经胜利了，相反，我们还要遭受可耻的失败。

如果我们配合世界保卫和平的力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障了世界的和平，也就是说，保障了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那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大体步骤应该是怎样的呢？

首先，我们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已有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器化。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要循着这样的道路前进。

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步骤？

在恢复中国的经济并尽可能发挥已有的生产能力之后，第一步发展经济的计划，应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工业以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只有轻工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农民需要的大量工业品，交换农民生产的原料和粮食，并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

6 同时，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也可以把劳动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这对于改进人民的健康状况，在政治上进一步团结全体人民，也是非常需要的。而建立一些必要的急需的国防工业，则是为了保障我们和平建设的环境所不可缺少的。只有在这一步做得有了成效之后，我们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并发展重工业。只有在重工业建立之后，才能大大地发展轻工业，使农业机械化，并大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能循着经济发展的步骤来提高，经济建设能够继续发展一步，也就造成了使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一步的可能性。否则，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不可能提高的。如果有人要勉强地去提高，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经济事业的负担能力，那就阻止和破坏经济事业的发展，在最后，不独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反，还要



破坏人民的生活，使人民生活水平降低。这就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观点，是一种经济主义和片面福利的观点，一切觉悟的工人和劳动者必须反对这种观点。

发展中国经济，使中国工业化，是需要巨大的资金的，而没有资金，没有数百亿银元的资金投资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那就不要想加快我们的工业化。但是从哪里并且怎样来筹集这些资金呢？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中，筹集资本的方法，除了无情地剥削本国的工人和农民，并使无数的小生产者和中等企业主破产，以集中资本之外，照斯大林同志说，还有以下三种方法：依靠对于殖民地的掠夺，依靠军事赔款，依靠奴役性的借款和租让。但是，这些办法，我们都是不能采取的。无情地剥削本国人民和对于殖民地的掠夺，这是与我们国家立国的原则根本相反的。在奴役性的条件下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借款和让出租让地，我们当然也是不能采取的。在平等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取得借款和实行租让，原则上是可以的，我们也已经做了一些，以后或许还可能做一些，但是不能取得很大资金，因为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需要很大的资金去发展他们的工业。因此，我们筹集工业资金的办法，也和以前的苏联差不多，就只有由中国人民自己节约这一个办法。除开这个办法，我们就不能筹集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巨额资金。

由于中国人民已经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避免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掠夺，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免除了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又由于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使之成为国营企业，再加之以劳动人民生产热忱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各种节约制度的建立和降低成本等，中国人民在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是能够用节约的办法由自己逐步地筹集起工业化所需要

的大量资金的。人民的这种节约，当然应由国家的税收，国营工业、商业和银行的利润，以及发行建设公债等等办法来实现，而不是要每家每户地去直接节省。

为了保卫中国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而为了要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与加快工业化，就需要由人民节省出大量的资金以投资于经济事业。而要人民节省出大量的资金，就不能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就是说，在最近一二十年内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不能不受到一些限制。这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创造劳动人民将来更好的生活，在将来能够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为人民节省下来的资金不是用来满足剥削者奢侈的生活，更不是用来满足政府办事人员的腐化生活，而主要的是用来满足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这就为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建立了可靠的基础。

8 这一点，是应该使所有的工人和劳动者都来了解的。这就是说，我们为了筹集资金去建设我们的工业以创造将来更好的生活，在我们不饿不冻并能保持通常的健康的条件之下，我们尽可能多节省一点，少花费一点，以便由国家把资金积累起来，去加快工业化速度。

斯大林同志说过：“一个农民，他积累了少量的钱，他不用这些钱去修理犁头，革新自己的经营，而却买了一架大留声机，……花光了”。这样的农民，是不会创造自己幸福的生活的。这对于我们的国家也是一样。如果能够从人民的节省中筹集一些资金以投资于工业，但我们却不这样做，而由大家在消费中花光了，那我们就不能创造人民的幸福的生活。这就是说，在建设时期内，存在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由人民积累资金以加快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应使广大人民彻底了解这个矛盾，以便获得适当的解决。

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工业化都能相应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相应提高，而且这些国家最后不能不变成帝国主义，去侵略其他民族和国家，取得原料和市场来维持自己已经发展起来了的工业，并因此而要进行世界大战。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这条道路我们是不能采取并且是必须避免的。

但是，世界上还有另外一条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或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工业化的道路。采用这条工业化的道路，就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相应地逐步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避免失业、饥饿和破产的痛苦，并且不需要去侵略其他的民族和国家，更不需要进行战争。这是我们应该采取并且必须采取也能够采取的道路。

在世界历史上就只有这两条国家工业化的道路。除此以外，是没有第三条路的。有人说要走第三条路，这只是在欺骗人民。如果有人在“诚意”地幻想第三条路，那也只是在“诚意”地自欺欺人，其结果是没有两样的。

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发凡

——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大纲第 1 ~ 2 讲

王亚南
(1951 年)

10

王亚南 (1901—1969)：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

1901 年出生于湖北黄冈。1923 年考入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1929 年大学毕业东渡日本，在东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后来翻译马克思伟大巨著《资本论》奠定基础。“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在上海从事研究和翻译工作，后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后因国民党的通缉前往德、英躲避。1935 年再次回国，与郭大力重新投入《资本论》的翻译工作。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 年上海沦陷，王亚南到武汉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同年，与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三大卷全译本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39 年武汉沦陷后，王亚南辗转到了重庆，1940 年 9 月到广东任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创办并主编《经济科学》杂志。1944 年，由于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嫉恨被迫离开中山大学，前往福建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并创办《社会科学》杂志和



经济科学出版社。同年应邀兼任厦门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1945年出任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兼法学院院长。1949年1月，由党组织帮助离开厦门大学前往香港，5月初又由香港北上到达北京。不久，在清华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1950年6月，被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时，他当选为学部委员、常委。1969年因患癌症病逝于上海，享年68岁。

王亚南先生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出版译著41部，发表论文300余篇，是一位译著丰富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领域的杰出贡献主要有：首次全译了《资本论》三大卷。成为马克思经济学说在中国系统传播的里程碑。他和郭大力先后用了8年时间翻译了6部经济学和经济史名著，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王亚南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最早的学者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就从中国经济史入手，研究旧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曾完整系统地提出著名的“地主经济论”。关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理论研究，是王亚南先生一生中最为杰出的贡献。其中代表作为《中国经济原论》以及《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通过上述著作，他对于旧中国的商品经济理论、资本理论、利润利息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官僚政治理论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形成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王亚南先生在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上所作的贡献是，极力倡导“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学”，提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在这里，我们就是选取了王亚南先生的两篇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

《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发凡——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纲第1~2讲》（《新中华半月刊》1951年第14卷，第5~6期）是王